

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

第2辑

主办单位：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主 编 董劭伟

ZHONG HUA LISHI YU
CHUAN TONG WENHUA YAN JIU
LUN CO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

第②辑

主办单位：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主 编 董劭伟

ZHONG HUA LISHI YU
CHUAN TONG WENHUA YAN JIU
LUN CO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 第2辑 / 董劭伟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161 - 8761 - 6

I. ①中… II. ①董…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②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K207 - 53②K2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988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0.25

插 页 2

字 数 436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辑出版经费来源：

-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1YJAZH020）
-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区域经济重点学科建设经费（区域经济重点学科系列丛书出版经费）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重点科技创新项目（N130223001）
- 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15040602）

编委会

曹金娜	柴 冰	董劭伟	冯学伟	胡耀飞
孔祥军	李玉君	齐海娟	秦 飞	任欢欢
王红利	王莲英	王 蕊	卫 丽	吴留戈
张 阳	左海军			

学术顾问

(按拼音顺序排列)

- | | |
|----------------|----------------|
| 卜宪群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 川本芳昭 (日本九州大学) |
| 杜家骥 (南开大学) | 杜文玉 (陕西师范大学) |
| 樊志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黄朴民 (中国人民大学) |
| 霍存福 (沈阳师范大学) | 蒋重跃 (北京师范大学) |
| 黎 虎 (北京师范大学) | 李华瑞 (首都师范大学) |
| 李文才 (扬州大学) | 娄成武 (东北大学) |
| 孙继民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 孙家洲 (中国人民大学) |
| 沈卫荣 (清华大学) | 田广林 (辽宁师范大学) |
| 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 | 王晓毅 (清华大学) |
|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 | 乌云毕力格 (中国人民大学) |
| 张剑光 (上海师范大学) | 张金龙 (首都师范大学) |
| 仲伟民 (清华大学) | 朱 英 (华中师范大学) |

目 录

专栏: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科建设

独立思考 推陈出新

——史学大家黎虎先生访谈录 黎 虎 董劭伟(3)

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学术论坛

——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科建设

座谈纪要 董劭伟 王莲英 陈厉辞(16)

《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 张金龙(47)

汉唐史专题

从五行模数看两汉都城五郊坛制度 张 军(65)

《三国志》历代史评价价值初探 金 霞 李传军(80)

北魏前期中散官制再探讨 徐美莉(97)

试论4世纪末北魏、后燕间北中国的争夺战

——以探讨参合陂之战的性质为主 [韩]李椿浩(109)

关于“安史之乱”以后讨击使职的几个问题 李文才(121)

唐代学官的选任标准及变化 董坤玉(147)

域外汉学研究

大唐西市博物馆新藏唐《张茂宣墓志》考 …… [日]村井恭子(159)

传统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统治集团与民众利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 付开镜(179)

宗教史专题

脱凡入圣:唐宋时期五祖形象的解构与重塑 …… 冯金忠(193)

从俗世公主到佛教菩萨

——石家庄苍岩山南阳公主信仰初探 …… 宋燕鹏 丁磊(212)

文献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整理本《毛诗注疏》卷三、卷四、卷五

点校补正 …… 孔祥军(239)

南唐陈致雍《晋安海物异名记》佚文辑证 …… 胡耀飞(333)

秦皇岛地域文化专题

试论秦皇岛地域文化发展与时代价值

——以孤竹文化为中心 …… 王红利(355)

民国档案整理与研究

民国时期耀华玻璃公司董事会会议事录摘编 …… 王莲英(365)

民国时期耀华玻璃公司名称沿革 …… 王莲英(371)

秦皇岛港藏民国档案之外文书信等选译和题解	张 阳(379)
----------------------------	----------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博士专题论文

宋代硫黄的管理及应用	任欢欢(413)
敦煌文献对《首楞严经》的引用探析	柴 冰(428)
清中期粮船水手组织与国家社会控制力 ——以道光五年嘉兴白粮帮械斗为例	曹金娜(443)
近代天津银号的拨码及其特点	左海军(452)
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及其伦理问题初探	王莲英 董劭伟(458)
2015 年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历史学团队 学术会议动态	董劭伟(468)
征稿启事	(473)

专栏：中国古典外交
制度学科建设

独立思考 推陈出新

——史学大家黎虎先生访谈录

黎 虎 董劭伟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社会科学研究院)

【引言】2015年6月27日，在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报告厅，举办了“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学术论坛（第二届）——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科建设”。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宜春学院等省内外高校或机构的十余位专家，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历史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社科院、语言学院等院所的教师及秦皇岛市碣石暨徐福研究会、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等机构的专家参加了本次论坛。首都师范大学张金龙教授主持座谈会。在座谈会期间，董劭伟博士对黎虎先生做了学术访谈，兹据访谈录音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董劭伟：黎先生，您好！我是您的第一批博士生张金龙教授和李文才教授的学生，多年以来一直关注您的学术研究和成果，但报刊文献很少有关于您学问人生的介绍，作为持续几十年笔耕不辍，从先秦到汉唐都有重要著述发表的史学大家，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使得我们非常期待了解您的人生经历，请您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谈谈您对自己学术生涯的评价。

黎虎：“史学大家”绝对不敢当！现在“大家”太多了，我就别去凑这个热闹了吧。您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客观评价自己这样的问题。成就一个学者或历史学家需要三个条件，即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指的是人所处的时代背景。这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第二是当时的思想自由度，就是能不能独立的思考。“地利”指的是人的家庭、家族环境。也包括两点，一是家庭、家族的经济状况；二是家庭、家族的文化状况。“人和”指什么？就是每个人自身的素质及其与客观环境的统一。近代这些著名学者中，陈寅恪是这三者的完美结合，因此他的成就最突出。有人说他是几百年来唯一的一个人，不是偶然的。虽然陈寅恪那个时代生存环境并不好，但是他家庭良好的生活环境弥补了这个缺陷。他的家庭是典型的世家大族、文化家族。祖父是湖南巡抚，夫人是台湾巡抚的孙女，因此不发愁日常生计。这个文化世家高度重视文化，给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虽处于清朝末年，但他的视野是开阔的，具有世界眼光。他12岁赴日本留学，至35岁游遍欧、美、日。他具有传统文化的牢固根基，兼习西方文化，从而能够将中西方文化相结合，思维的活跃程度与眼界的开放程度无与伦比。周一良先生在这三方面也是高度统一。周先生生活的时代背景与陈寅恪差不多，家庭环境不光是一个官宦之家，而且是一个文化世家，周氏家族很多人都是研究古典文化的。他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化基础。周氏家族也具有世界眼光，周先生自幼学习日文。吕思勉先生虽然八九岁时家道中落，但条件也是不错的，也出生于一个文化家族。5岁时，姐姐和族兄跟他一起读《纲鉴辑览》，之后他的母亲教他《说文解字》。由此可见，出类拔萃的历史学家多是这三者完美或比较完美统一的。

我刚才说要客观评价自己，我觉得我的情况是“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文化大革命”前，整整折腾二十多年，二三十岁是人生最好的年龄，最精力充沛的阶段。我们那时大部分时间搞政治运动去了。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与你们这一代大不相同，比如，现在有人学习很用功，做出成就，大家都会很称赞、很羡慕。那时不行，时时得提防被扣上“白专”帽子，规定的条条框框严格束缚你的语言与思想。大学四年，就一二年级读了点书，三四年级就开始折腾了。“文化大革命”过后，我赴开封第一次开学术讨论会，参会的漆侠、

朱绍侯、高敏、杨志玖等都是务实的历史学家。在这个会议上我有了转变，之前我重点关注先秦，这时决定转而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后来回到学校有人问我：听说你要往魏晋南北朝史转了？我说试试看吧，问我的这位同志挺耿直，说都四十多了，还“试试看”？的确是这样，都四十多岁了究竟还有多少时间？“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家有这样的疑问：历史系还办不办？历史学还会不会存在？我都曾经想过要转行写小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做学问？我说“比下也不足”不是开玩笑，因为你们赶上了好时间，大好年龄就已经正正规规地开始了历史研究，而我们这辈人只能说是挤上了末班车，好不容易抢上了一个座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您说能有多大学问呢？所以说要客观地评估自己。改革开放后，国家照顾我们这代人遭受的损失，还给评了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些高帽子一戴，就觉得自己学问多大？一定要客观地评价自己，对自己有个客观认识，不能因别人的赞美而忘乎所以。你们的“天时地利”都比我强，因此，你们将来都比我强，再有几十年，你们都会大大超过我，这是没有问题的。

董劭伟：先生先后出版了《汉唐外交制度史》和《汉代外交体制研究》，这是您对自己20世纪提出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深入而专通的研究。我们都知道，先生除了提出“中国古典外交制度”这个学术命题，并写出了一百余万字的著述之外，在先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社会史、制度史等领域，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知道先生最早是在先秦史领域做研究，而后开始魏晋隋唐史研究的，能否就您的治学经历，给我们后学详细介绍一下您从事这些领域的缘由？

黎虎：我简单谈谈我的学习过程，或者说是奋斗过程。刚才讲第一个问题，大家会觉得您不是泼冷水吗？怎么净说泄气话？但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虽然“天时、地利、人和”无法选择，无法逃避。我们老百姓说这就是“命”，我们不要把这当成“封建迷信”的说法。人生活的客观条件无法选择，这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就决定你的各个方面。用中国古话讲就是“命”，老百姓的语言嘛。没人能跳出这个“如来佛的掌心”，但我们又不是无可

作为。因为事在人为，同样的这些条件个人情况为什么不一样？可见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能够有所成就的。

1958年开始“大跃进”，我大学第四年开始下乡劳动，去门头沟煤矿劳动。当时抽出一部分人写矿史，我被抽出来翻阅了十来天档案，突然来通知，说我们当中有少数人要去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历史系学生抽调6个，老师2个，我有幸忝列其中。去民族研究所报到那天，只有翁独健先生在办公室，得知只剩下内蒙古、宁夏两个自治区了，我问翁先生去哪里好？他说内蒙古少数民族多，建议我去那里，于是我就确定去内蒙古，到了那里后被分配在鄂伦春族调查组。那个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主体是当地的民族研究所人员和地方干部，还有教师和学生，北大历史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都是全体参加，北师大就去了8个师生。我这个小组深入大兴安岭调查鄂伦春族几个月。调查完毕回到呼和浩特，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分析收集的材料。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分析新中国成立前鄂伦春族究竟处于什么社会阶段？大家提出了很多说法。我学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结合鄂伦春族的情况，提出鄂伦春族新中国成立前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相当于马恩著作中的“村社”阶段。我的这个观点被调查组所接受，并作为重要成果向中央汇报。当时吕振羽先生主持汇报会，他肯定了这个说法，提出应当进一步加以具体论证的意见。后来，调查组确定4人为编写组成员，分别是内蒙古民族研究所一位研究人员，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和中央音乐学院各一位老师，我被排在第二，他们三人都是在职人员，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生。调查组其他人员则负责资料等“后勤”工作。当我正忙于编写工作时，一位北大、另一位中央民族学院同学把我叫去，说要把新中国成立前鄂伦春族社会性质问题写成文章投《民族研究》，他们都已商量好了之后才找到我，同时把我的名字放在第三位。这就是当时发表在《民族研究》上的那篇《对解放前鄂伦春族社会性质的探讨》。这篇文章完全是按照我在调查组公开发表的观点而写成的，当时也没有“维权”意识，怕影响关系，虽然不满也只好隐忍。这应当就是我最早发表的论文。打倒“四人帮”后，我的第一篇论文《刘知几为武则天“制造舆论”吗？》是在《历史

研究》发表的。现在看来是肤浅的，带有很明显的“文化大革命”批判色彩。但在当时不得了，每期《历史研究》出版后《人民日报》都要报道，那期提到了三篇文章，其中有我那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的“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也播放了这个信息。为什么我写了这篇文章？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搞“评法批儒”，我被派去与“工宣队”一起搞《史通》，从而有机会涉猎了一些唐史，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讽刺的是没有写出“四人帮”需要的批判稿，反而写了批驳“四人帮”谬论的论文。后来，我的研究重点转入魏晋南北朝史，第一篇论文也是在《历史研究》发表的，就是那篇《蜀汉“南中”政策二三事》。1986年参加在安阳的“殷商国际文化研讨会”时，写了一篇《殷代外交制度初探》，也在《历史研究》发表了，这是对我搞了一个阶段先秦研究的一个交代。后来又在《历史研究》发表了《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等。近几年，对“吴简”做了一些研究，第一篇成果《“吏户”献疑》也是在《历史研究》发表的。基本上是搞什么问题就会有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前些年有个博士生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当时北师大历史系在《历史研究》和《人大复印资料》登载文章最多的是我（我没有调查过这个问题）。以前听我们教研室主任郭澎先生说，他听《历史研究》的编辑说，外地有的老先生说：一辈子能在《历史研究》发表一篇文章此生足矣。我们当然不能以在《历史研究》发表了多少文章而论长短，但也不能说这毫无意义。我讲这些并非为了炫耀，而是说我们做学问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虽然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但不动是不行的。我们一生会接受学校、单位安排的很多任务，派你做这个、做那个，你一定事事要尽心。同样是参加了这些工作，为什么有的人能从中学习到东西，有了一些成果，有的人则不然？有的人像荷叶一样水过无痕，有的人像海绵一样不断将水吸收进来而日益精进。也算是一种巧合吧，我学习历史的过程，基本上是从原始社会到先秦，再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沿着历史发展的顺序一步步下来，而且每一步都留下了深浅不同的脚印，这对于认识、思考历史的发展和进行纵向比较是有利的。

董劭伟：先生治学专精，教学方面是一代名师，我的老师及我认识的很多老师都是您的学生，很多都是您当年本科教学时传授过学业的学生，据说他们对您当年授课的精彩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能否谈谈您在教学方面是如何与科研结合起来的？

黎虎：刚才润珍（牛润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提到当时第77、78届学生对我讲课的反映很强烈。他们是第一次全国考试进来的，学校安排我讲先秦的历史。讲课效果可以说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不但同学反映很好，学校的领导也很是注意。这样的讲课效果不是偶然产生的，第一，我做少数民族调查，正好是原始民族。所调查的民族人数不多，与当时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正合适，不大不小，用一年时间将这个民族的人文环境研究得比较透彻。因此，对什么是原始社会、原始民族有一些感性的东西。这也导致现在自己的研究都尽可能从原始社会追根溯源。第二，我毕业后第二年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讲授《历史文选》，在此期间对《诗经》《左传》《尚书》等古典文献下了些功夫，为研究先秦历史打了点基础。之后，教研室又让我随杨绍萱先生学习金文。杨绍萱先生就是在延安执笔创作历史剧《逼上梁山》，曾得到毛主席亲笔书信的那位老先生，他对金文也很有研究。研究金文、甲骨文对于学习殷周的历史有所帮助。第三，“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安排古代史的七八位老师去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做考古调查，这几个地方正是中华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当时考古界并不封闭，这些考古点的负责人带我们直接到发掘现场参观，打开文物库房，亲自给我们讲解。比如周原甲骨刚发掘出来我们就去看，记得当时是刘士莪先生接待我们；雍城秦遗址是韩伟先生接待我们的。扶风县的罗西章先生，他的仓库满屋子西周铜器，很多铜器是新发现的，从中得到不少新的铜器铭文。

陈寅恪先生有“四不讲”，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我没有陈寅恪先生的自觉，但我的讲稿都是自己编写的，不愿意讲老生常谈的，而是融入了最新的学术成果，将民族调查、古文字、古文献研究、考古调查等融合在一起，因此大家都感到很新鲜。当时不但学生感到新